

中國十大隱士

中國文化名人評傳叢書

黃修明 張力著

延邊大學出版社



· 中国文化名人评传丛书 ·

中国十大隐士

常金仓 主编

责任编辑:玉 弩 崔厚泽

封面设计:张宗尧

中国十大隐士

常金仓 主编

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延吉市延边大学院内)

新华书店发行

石家庄市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6.125

字数:130 千字 印数:1—10.000—15.000

1992 年 8 月第 2 版 1992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7-5634-0292-6/Z·34

定价:3.20 元

《中国文化名人评传丛书》序

舒大刚、吴绍钜同志主编的一套《中国文化名人评传丛书》即将由吉林省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嘱我为之作序，我欣然接受，我深切感到这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它的意义我们随口可以说出许多，比如说它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提高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等等，这当然是对的，它必然会起到这样的作用。然而我认为，它的意义应当在更深远的层次上考虑。它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有别于西方的哲学精神提供了有血有肉的生动例证。我们从中不难看到中国哲学在人生论上与西方的根本不同，中国的人生论强调个体与社会的统一，把握个体所以成为个体的内在规定性，揭示个体的现实性和丰富性。中国哲学人生论讲的个体是生活在现实之中的具体存在，内里包含着社会的整体。中国哲学不是否定个体，而且对个体的充分肯定。西方哲学的人生论强调个体与社会的对立，突出超脱社会约束的个人随意性。这样的个体是抽象的，不现实的。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在人生论上的差异不能归结为前者以集体为本位，后者以个体为本位。实际上二者都以个体为本位。问题在于二者论述的个体之内涵不同。中国哲学的人概念由具体上升到抽象，由抽象继续上升到具体，抽象寓于具体之中。人在现实中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因而个体的人总是体现着社会的整体精神。西方哲学的人概念在由具体上升到抽象之后，再未继续上升到具体，因而个体的人处在与社会整体的对立状态中。说得明白一点，中国哲学提倡爱人，合乎

逻辑的结论是人人爱我,从而人们彼此是和谐的。西方哲学宣扬为己,合乎逻辑的结论是人人自私,从而人们彼此是对立的。

代表中国哲学主流的是儒家。儒家之外还有道家和佛家。道与佛与儒家大不相同,但是它们的人生论的基本精神与西方文化中的个人利己主义仍然不一样。道家缺乏社会责任心,鼓吹“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庄子·让王》),是很自私的。但是它指引人们回归自然,泯灭人与物的差别,达到物我相忘,物我为一的境界,其理论归宿恰是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社会与自然的统一,与西方哲学个体与群体对立的个人主义人生论毕竟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的佛家,其人生论在追求普救众生和精进奋斗方面与儒家并不牴牾,而在向往出世忘我,遁入空玄方面又与道家几近合流,终于与西方哲学的利己主义最后划清界限。儒道佛尽管差异显然很大,但是一旦与西方文化相抗衡的时候,它们的共性便显现出来。它们的境界是高尚的,它们的修养是利人的,它们的追求是人道的。鼓吹个体表面上爱人而内心为自己的西方哲学在中国哲学面前不能不黯然失色。所以西方的物质文明发达了,而西方人精神竟一直处在痛苦、矛盾的状态,原因就在这里。近世以来船载以入的洋枪、洋炮曾经一再割占中国的土地,而传教士随身带来的西方文化却始终未能征服中国人的心,原因也在这里。

任何文化都是民族的、历史的,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不同的民族文化当然可以相互渗透,但永远不能彼此取代。日本文化曾受过中国文化的强烈影响,接着又受到来自西方的文化冲击,然而都没有改变它的基本性质,日本文化依旧

是日本文化。当我们说到中国文化优秀的时候，一点都不意味着西方文化毫不足取。事实上中国文化早已包含着外来文化的优秀部分；近年兴起迄今仍在继续的“文化热”中出现的反传统倾向，把传统文化与封建主义等同起来，甚至看成一切罪恶的渊藪，进而鼓吹用西方文化取代中国文化，这样的思潮难道能够不令人困惑、忧虑！

读者见到的这套丛书对于我们认识这个问题很有好处。它把我们民族历史上的诸多文化精英，通过人物评传的方式如实地成系列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这些人是具体的、生动的，他们属于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事业、生活情趣、生平遭遇乃至道德境界各有特色，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表里一致，身心和谐，行为上表现的，恰是内心追求的，不象西方古典豪杰和近世个人主义英雄那样表面上彬彬有礼，口唱爱的赞歌，骨子里却藏着一把为了一己的利益随时准备置他人于死地的剑。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精华，也是这套丛书的价值所在。读这套丛书，首先了解这一点是必要的。

吕绍纲

1990年2月

序

隐士是与中国整个古代历史相始终的文化现象。在传说的尧舜时代，就有高蹈肥遁的被衣、王倪、巢父、许由，到民国初年还有哭庵与易顺鼎等，年历四千，人逾万数，足可以写成一部单独的历史。事实上，旧史中向来给这些人保留着地位。东汉士大夫讲究名节，所以范曄《后汉书》始设《逸民传》，二十四史有十三部书中列有“隐逸”、“处士”之类传记。魏晋时嵇康和皇甫谧先后收集诸子遗文及正史编撰过《高士传》，这是最初的关于隐士的专史，（当然其中不乏诸子百家寓言式人物）此外各种方志、志怪，笔记小说中还有许多名不见史传的隐者杂侧其间。只是到了本世纪，工业社会把隐士们驱赶得无处容身，历史学家才淡忘了这部分人的生活。

隐士是古代知识分子中一部分人忍受不了社会压迫、逃离生产关系，尤其是政治关系，而与当世采取不合作态度的人。这些人大多数是在个人生活经历中遭到挫折和不幸，厌恶了世俗生活，于是遁迹于山林，当然这样的生活选择也与个性、志趣、职业等等密切相关。《后汉书·逸民传序》把他们隐逸山林的动机分为六类：有“隐居以求其志”，有“回避以全其道”，有“静己以镇其躁”，有“去危以图其安”，有“垢俗以动其概”，有“疵物以激其清”。举凡外族入侵、国内混战、党派倾轧、制度变乱、科场舞弊、求仕不遇，都可以把大批知识分子赶入与世隔绝的高山深谷、海上孤岛。

最初，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逃逸极度仇视和反感。传说姜

太公初封于齐，有贤人蛰居海上。大臣们问他该怎样对待这位隐士，太公说应该赶快杀掉，否则大家都学起他的样子，谁来供我们驱使。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这样一种观念，一位好的君主应该是一个善于团结人民的人，古代叫做“聚民”。人民是永远没有错误的，所以君主们必须把成绩归于人民，过错归于自己，人民纷纷逃散，只能说明自己为政无方。春秋末年，孔夫子根据这个传统的信念劝告统治者改变对待隐士的态度，叫做“举逸民”而天下归心。但是真正把优礼隐士当作一项政策却是汉代以来的事情。

汉代及以后对隐士态度的改变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三代以来光有天下的帝王和世守封疆的诸侯都是民族社会里以人民公仆为己任的首长后裔，那些人民公仆，毕生勤劳民事，以至于死，在人民心目中塑造了极其光辉、极其神圣的形象，因此人民依然习惯以这样的形象来要求他们已经蜕化变质的子孙。这样执着的民众心理使中国文化中形成一种非常独特的政治形式，我们权且把它叫做“典范政治”或“模范政治”。这种政治形式通过统治者率先做出表率，然后人民模仿他的样子使社会达于秩序状态，古话叫“圣人法天，贤者法圣”。具体说来，人民要求和冀望的君主是一个清廉、节俭、勤劳、和善，具有奉献精神的人，禹汤文武是这种人格的化身；一切贪婪、浪费、懒惰、自私、残暴、纵情肆欲都是人民所不能接受的，桀纣幽厉是这种卑劣人格的代名词。但是，社会并不完全按照人们的美好愿望选择它的道路，统治者的人格日益向美好愿望的反面发展，他们完全丧失了先前的表率模范作用，可是他们还要像以前那样要求民众，于是不得不把他们从前一向仇视的隐士抬出来代替他们去做民众的榜样。第二，春秋战国之

交，私人办学造就了过剩的知识分子，这样知识分子的就业就充满了竞争性，为了谋取职业，很多知识分子变得人格低劣，不择手段，士分为清浊二流。历史上即使最英明的君主也总是喜欢逢迎拍马，讨厌任情直言，所以政府中收罗到的读书人率以下品为多，这部分人不仅效率低下而且败坏官府形象，多少次人民造反使统治者惊恐万状甚至丧失权力，其中差不多都有这批人一份“功劳”。君主们虽不得不任用他们，却对这蠹虫一样的爪牙深感忧虑，因此把那些山林隐逸请出来，使成对照，以激浊扬清。这都是对“典范政治”的补救，假若中国自始就没有“典范政治”，那么隐士们即使饿死山林，恐怕也不会有人问津。中世纪的西方教会中不乏衣衫褴褛、囚首丧面的隐修者，但是欧洲君主很少有人像中国帝王那样耐心，三番五次，深入不毛，去延聘归隐的士人。当然也不排除其中有些帝王下诏招隐也有出于爱惜人才的动机。

隐士为世人所称道，一为他们的人格，一为他们学问。从整个历史上观察，由于专制主义的强化，这批人的人格也一代不如一代。魏晋以上的隐者大多是厌恶官场的黑暗，羞与统治者伍，为争取独立人格，宁肯忍饥寒之苦。而宋元以降的隐者，大多是对异族的压迫怀有抵抗情绪。前者是自觉自愿，后者是不得不然。传说时代的许由，尧让天下于他，他以为沾污了自己的视听，竟跑到颍水之滨洗耳拭目；战国时的庄周，楚威王征他为相，他竟说宁为活龟曳尾泥涂，不为死龟陈列庙堂；到汉代，隐者遇征不愿俯就，便不得不托病婉辞。魏晋以后，隐士队伍中甚至产生了一些叛徒，他们利用政府招隐，沽名钓誉，坐求善价，人们把这种花招叫做入仕的“终南捷径”，南朝梁有陶弘景隐居不仕，梁武帝每有重大决策，必定入山征

求他的意见，人称“山中宰相”；隋文帝时京兆杜淹知文帝爱隐者，与友人相率隐居终南，被隋文帝谪戍江表；北宋洛阳人种放先隐后仕，贵为帝友，终遭天下嗤笑，这班人索性就谈不上“品节”二字了。

真正的隐者固然视富贵如浮云，但是他们中间也有一些人行为过分特立孤傲，标榜清高至于矫揉造作。隐士既厌恶政治生活，不愿与官府往来，似乎还容易理解，如宋真宗时陕西隐者魏野，《遗史记闻》说：“真宗祀汾阴，登山望林麓间有亭槛，问曰：何所？乃隐士魏野草堂，遣使往召之，野方鼓琴教鹤舞，闻使至，抱琴逾垣遁去。”隐士既厌恶世俗人情，不愿与亲属往来似乎也是容易理解的，如《晋书·陶淡传》说：“亲故有候之者，辄移渡涧水，莫得近之。”但是有些人“杜门谢客”并不彻底，似乎故意戏弄和侮辱来访的客人，如清杜茶村对于故旧或本地官吏偶亦见之，但在门内设一道竹篱，篱门之外设一坐椅，客来如逢卧睡，则须坐在椅子上耐心等候。余若水围着被子见客，自称有病不能行礼，但是客人辞出未及数步，回头却见他已与一婢抬粪灌园了。（《国朝先正事略》）更有甚者如明代无锡的倪云林（名瓚），客人来访离去，总要洒水洗过他的坐处，（《明史》）这简直象《红楼梦》中的尼姑妙玉所为，未免太刻薄了，隐者中有些憎恶文明的人，认为衣服也是人类的伪饰，竟实行裸体运动，东汉袁宏，“筑室于庭中，闭门不见客…首不著巾，身无单衣，足著木屐。”（《后汉书·逸民传》）魏晋间的刘伶裸体见客更是人们熟知的故事。这些本来是不足为训的行为，可是也许正因为敢于这样卓然不群，也曾引起过世人莫名其妙的敬羨。

隐士们大多数靠种田、采药、教书、卖卜等维持极其清淡

的生活，但他们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贡献与影响却是很大的。蒋星煜先生在四十年代写的《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中特别阐述过隐士对中国绘画与诗歌的影响，他说中国画在其发轫的时候是以人物鸟兽为主要题材的，到晋顾恺之《云雾望五老峰图》之后才开山水画的先河，到宋代才出现一批天才横溢的山水画家而使山水画成为中国画的主流，这大抵是因为隐士们居于山光水色之间，审美趣味渐集中在自然景物方面所致。诗歌也是如此，魏晋以前抒情诗是诗歌的大宗，到晋以后，描绘自然风光的写景诗、田园诗就发达起来。名家有陶渊明、王绩、孟浩然等。其实隐士们的创造远不止此，思想家中出过庄周、王夫之那样的杰出人物，他们的思想在身后一次又一次掀动着人们的心潮，导源于庄学而后曾形成的养生导引之学也是在隐士们之间诞生的，这些人的学问、生活方式对于中国社会风俗的感染也是不可忽视的。所以研究隐士的生活对于认识我们古老民族文化是十分重要的。

贾岛《题隐者居》说：“虽有柴门长不关，片云孤木伴身闲，犹嫌住久人知处，见拟移家更上山”。这些人数十年躲在人迹罕至的地方，他们的生活细节很少为人所知，仅凭书契上留下来的片光只羽要写出一本生动的隐士传，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本小书选入的十位隐士，虽然是根据时代、行当、类型以及材料的多寡从上万名隐士中挑出来的，可是他们仍然不具备“全权代表”的资格。

这本传记是在很短时间里写成的，加上我们能力有限，定然会有不少缺点和错误，可是我们相信把这个小册子与这套小丛书的儒、释、道诸传合在一起，仍可使读者对中国古代文化和古代知识分子状况获得一点轮廓性了解。

常金仓

1990.4.3

目 录

华南真人	庄 周	(1)
布衣高士	鲁仲连	(21)
季汉高士	郭 泰	(28)
爱菊诗人	陶渊明	(42)
斗酒学士	王 绩	(70)
鹿门高隐	孟浩然	(93)
终南肥遁	种 放	(117)
王者师友	刘 基	(133)
三晋癯仙	傅 山	(149)
船山硕儒	王夫之	(170)

华南真人

庄 周

(约公元前 369—前 289 年)

战国中期的宋国有一位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学者名叫庄周。这位学者愤世嫉俗又超然物外，头脑高度理性化，言语却“洗洋自恣”、夸诞谐谑。他一生蛰居草泽、衣食无着、缺朋少友，竟然著书十余万言，与当世学者相诘难，人多不能屈。他浑身上下似乎很不谐调，但是如此独特的人格自有他独特的统一性。

—

庄周是宋国蒙人(今南商丘东北)，大约生活在公元前 369 年至 286 年之间，与战国有名的战争狂人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庄”是古代谥法里常用的一个字，而古人有用祖先谥号为姓氏的习惯，所以他的前辈人可能是很有身份的贵族。他很会写文章，连司马迁都称赞他“善属书离辞”，以常理推之他小时候受过很好的教育。不过他即使真是贵胄子弟，家族的兴盛时代离他也是很远的了。年轻的时候，他一度给人家做过管理漆园的小吏，这工作毕竟不是一个对后世产生过深远影响的

学者所适宜的，不久他就离开了。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好几次提到他的生活状况，有一次穿着打了补丁的粗布衣裳，足踏麻绳捆缚的草鞋去谒见梁惠王，^①他曾贫无隔夜之粮，向一个监河侯告贷过米粟，^②樵采垂钓可能是他经常用来对付辘辘饥肠的手段。^③这一切都是贫贱者的勾当，是祖宗没有留下丰厚的遗产，还是无经营之才、坐吃山空败落掉了？这些我们都无法知道，只有一件事情是我们所知道的使他贫困潦倒的原因。

春秋以前的知识分子并没有衣食之累，他们的社会地位是按照原始氏族分工原则确定下来的。他们在朝廷供职就像天子诸侯一样父死子断，世守其业。庄子如果生活在这个时代，他或者根本不可能成为知识分子，但只要跻身知识分子之列，就不会贫穷到如此田地。到春秋晚期，知识分子提供服务的那个阶级正在急剧地衰落，各种制度都在废弛，学校不办了，祭祀不举了，知识分子不受重视了，公元前539年齐国晏婴与晋国叔向论齐晋季世，晏子说当时齐国是“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饿”知识分子开始失业贫困。《论语·微子》也说王朝的乐工大师纷纷离开京城投奔诸侯或大夫之家混一碗饭吃。但是青少年总是需要教育的，文化知识总是需要人来传授的，于是有人出来创办私立的学府，孔夫子就是私学的首创者。私学创办起来后，新的知识分子一代代产生了，而且由于上学没有门第财产资格的限制，读书人的数量比以往成倍地增长了，但是无职无权的私学兴办者并不能给学生提供就业的保证。战国时代各国君主的兴趣在于发展经济，加强武备，使他们统治的

① 《庄子·山木》

② 《庄子·外物》

③ 《庄子·秋水》

地盘越来越大，一般的文化事业被视为无益的事情，他们不肯花钱投资教育。因此政府对知识分子的有限需求不再通过开办官学自行培养，改由民间私学培养的学生中物色自以为可用的人才。这样一来，官方是节省了一笔可观的开支，却给知识分子出了一道难题，从此读书人必需按照君主们的兴趣和需求来调整自己的学业。君主们常常是骄横自恣，好恶无常，读书人尽管努力适应都无济于事。《论衡·逢遇》说周时有一位年老白首、数仕不遇的人涕泣于涂，他少时学文，文德始成，人君好用老年。用老主亡，后主尚武，他只好改行学武，武节始就，武主又亡。少主始立，好用少年，而他已两鬓斑白。命运对于这类不幸者似乎在开一个不负责任的玩笑，无数才华卓越的读书人就这样度过了穷愁潦倒的一生。

战国士人的新境遇不仅导致了他们中间大批人的贫困，而且知识分子开始丧失了独立人格。有些人为了谋取现世的荣华，不得不放弃做人的尊严，甚至出卖灵魂，设法博取君主们的欢心和青睐。如果珍视人格，那么就不免素食水饮、衣履不完。

在读书人与政府的“双向选择”制度下，庄周本来有过摆脱饥饿和贫困的机会。在庄周那个时代，齐国东门外有个稷下学宫，这里招罗了天下不少著名学者，列第为大夫，不治而议论，孟轲、荀况先后在这里居留过，虽然不能实现平生抱负，弄碗饭吃还是可以的。也许因为庄周的学问与这班人毫无共通之处，他没有去。

《庄子·秋水》篇说楚威王听说庄周有大才，于是派两名使者赍了玉帛去迎接他，他却问使者道：“我听说楚国有一具大龟，死已三千年了，楚王用竹筒锦帛珍藏在太庙堂上。请问

此龟宁愿死后以遗骨见珍于世人，还是宁愿活着而摆尾于泥中？”使者说：“当然是宁愿摆尾于泥中啦。”庄周说：“请二位使臣反轡回国吧，我宁愿摇尾于泥中了。”这与数百年后嵇康与山涛书中所谓心逾长林、志在丰草的口吻毫厘不爽。庄周讨厌卑污齷齪的政治生活，有一次他到大梁（今河南开封）去访问梁相惠施，流言布满大梁，都说庄生此来欲代惠施为相。惠施立刻紧张起来，派兵在城中搜捕了三天三夜。庄周见到他说：“南方有一种鸟名叫鹓雏，从南海起飞要到北海去，此鸟非梧桐不肯棲止，非竹实不肯下咽，非醴泉之水不肯润喉。有一只鸱鸟正啄一只腐鼠，它看见鹓雏从头上飞过，以为是来抢这只死老鼠，于是向空中大吼一声以惧鹓雏。您今天派兵大捕庄生，岂不是以梁国吼我吗？”^①他把一国政权喻为一具令人倒胃的腐鼠，先秦诸子中恐怕不会有第二个人这样自命清高而使王公们闻之丧失自信、赧然汗颜的。在《则阳》篇中他说真正的圣人“其穷也使家人忘其贫，其达也使王公忘爵禄而化卑。”这一介穷书生确实是人穷志不短，在他的著作中描写了好几个诸侯听了所谓“体道全德”之人的一席宏论，顿时觉得身为千乘之主不过是人生的一大累赘。

大多数战国士人追名逐利，攀权附势有如过江之鲫，庄周为什么避之唯恐不及？也许正是贫困帮助他认识了社会上层的黑暗。《庄子》书中不象其它的诸子著作高赞尧舜文武、齐桓晋文，倒是记了几位凶残暴虐的君主。他说卫庄公蒯聩刚愎自用，强以拒谏，辩以饰非，颜回要到卫国去谏庄公，遭到孔子反对。庄周借孔子之口说陈仁义之言于蒯聩式的暴君之前，不仅

① 《庄子·秋水》